

数量分析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综述

□ 傅 吟

摘 要:数量分析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现代法学研究借助数量分析,可以看到更多法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阐述了数量分析的重要性,结合国内外的有关文献介绍了数量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中的几种主要的研究方法,为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数量分析;法学;综述

中图分类号:DF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7-0161-03

早在19世纪,国外就有学者使用数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我国则是到50年代才出现有学者用数学方法研究现实问题。50多年以来,数量分析方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不但在理学、工学等领域广泛运用,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学领域也有巨大的发展,表现出其极旺盛的生命力。法律经济学源于现代西方法学和经济学研究领域,是以研究法律在经济中的作用及其规律为宗旨的前沿理论。二者互相参照、互相借鉴,经济学弥补法学理论所缺乏的行为理论和规范标准,而法学则可利用其固有的高度成熟的规范价值填补市场逻辑所带来的不足。数量分析方法作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工具,自然也表现出它在法学研究中极大的潜力。借助数量分析方法,可以看到更多法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数量分析在法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经济学近几年的发展中,数量分析已经渐渐取代了传统经验分析方法过去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长期统治地位。法律经济学作为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数量分析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成为法学关注客观事实和科学的方法。

首先,法学问题往往使用的都是抽象的类似公平和正义这样的法律词汇来做为判断的依据,因此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从而导致大多数的问题由于所讨论的概念界限不清产生分歧。同样的问题可以有多种解释,这种主观就导致了法学陷入了诡辩的死角。在引入法律经济学的概念之后,法学研究似乎开启了另一扇门。经济学核心的数量分析方法有助

于将法学研究转向更加现实的角度进行问题的分析,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法学语言,相反地,则可以引导到可衡量的现实数据,如社会成本和经济效益等等。数量分析方法使得法学和经济学进行完美的结合,让法学研究摆脱语言的争论,转向更实际的经济效益和经济成本,使得法律的实施有据可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法律分析的效率。

其次,数量分析对于法学研究提供了比较精准的经济学工具和经济效率的标准。任何一种新的法学或是经济学理论,只有当它成功的解释了过去,尤其是历史统计数据之后,才能普遍的为大众所接受。对于政策的假设也是如此。比如,对于相关重大法律的实施情况和法律实效的检查,对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尤其在效果评估方面对立法和司法机关的意义非常重大。

最后,很多的数量分析结果都为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把握未来法律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科学并可行的分析依据。经过数量分析等实证研究检验过的理论或是政策建议更加具有说服力,恰恰是这些大量的实证研究加上适量的规范分析,才是真正理解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关键。

二、数量分析在法学研究的应用

美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可以说是数量分析法学的先行者。他在《法律的运作行为》一书中就将社会生活分为五个基本的方面——分层、形态、文化、组织和社会控制,并利用数量分析将其转换成为了一组普遍的变量,用以预测和说明法律的变化。他

本研究是教育部200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08JA790107)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傅吟,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博士研究生。

的贡献在于对法律现象中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纯科学的研究,而对于其他领域则未做太详细的论述。^[1]

近几十年来,法律经济学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也使得数量分析法学也崭露头角。目前而言,以法律经济学为嵌入点,数量分析方法的应用方法主要包括计量经济学分析法(回归分析、相关系数分析)、图表分析法(交叉图形分析、图象分析、表格比较分析)、数理模型方法(模型分析)社会调查法(问卷法、实验法)等。

计量经济分析和统计分析是数量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而言也是国内外学者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方法之一。周林彬(2001)对我国私力救济制度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公力救济以公权力为基础,主要体现为诉讼;私力救济以私权利为基础,主要体现为民间仲裁、人民调解和私了等。他建立了二元选择模型,以微观经济学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求解,并进行救济成本的分析、收益的分析和个体偏好的分析。他利用Logit模型得出结论:私力救济更加具有高救济货币收益和低时间的成本上的相对优势。^[2]冯玉军(2004)从法律经济宏观视角分析了犯罪与现代化的关系。他提炼出人类发展指数(HDI)和基尼系数两个最重要的变量建立了HDI——基尼矩阵,将世界上的国家按照这两个因素的高低分成四种类型,通过双因素交互作用方差分析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的犯罪状况的严重程度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结构有显著的关联,总体水平的结构上的差异各自和交互的决定了一国的宏观的犯罪状况。^[3]白建军(2006)以来自最高法院各业务厅、研究机构、出版单位、网站等权威机构公开发布发表的真实判决中的全部死罪案例为样本,以动刑、除刑、量刑、用刑四类焦点问题的有无为自变量,以有罪案件中是否死罪的结果为因变量也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了犯罪中是否构成死罪、死罪中是否使用死刑、死刑中是否立即执行的一些重要不同。他提出死刑问题的法律解释其确定性程度至少与法律规定本身的明确性程度和解释者所面对的具体案件中的具体焦点问题这两个因素有关,因此他认为应尽可能提高法律本身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并且增强控、辩、审之间的最佳互动,这样控辩双方的博弈所产生的焦点问题质量就越高,案件与规则之间的联系就越到位,法官的审判质量也就越高。^[4]Laszlo Goerke(2010)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产生纠纷时,员工遣散费的多寡不仅仅是与当时的法律制度有关,诉讼的成本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他利用

西德1991-2006的面板数据,发现员工由诉讼和其他法律程序中所产生的成本(包括可见与不可见的)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遣散费的影响因素。但是实际上遣散费目前却是完全由法律所定。因此他认为劳动就业方面的立法应该也将一些额外的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员工本身的经济条件等。^[5]

图表分析方法主要是将与待研究的法学问题直接以数据形式由图形或是表格反映出来,通过对比和对照解释和说明问题,得出结论。陈志武(2002)曾经利用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媒体监督与证券市场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政府效率和腐败水平等几个不同方面进行交叉图形分析,证明了如果没有媒体的自由监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问题。由于这种方法比较简单而且直观,因此它也被学者们广泛采用。^[6]王福华等(2007)研究了十多年来我国法院民事上诉案件发回重审率的变化图,发现目前我国二审法院存在着诸多发回重审的“潜理由”,部分二审法院存在着滥用发回重审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在立法上将发回重审的事由限定于法律问题,或者在审级功能正当化的基础之上使得上一级法院能够更加的尊重一审判决,同时赋予发回重审裁定对二审法院的自缚效力。他提出,构建以保护当事人程序利益为中心的发回重审制度的基础应当是无害性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和终局性原则。^[7]朱景文(2008)在研究中国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化问题上,将我国的法律工作者分为正规化、半正规化和非正规化三部分。他认为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的发展是决定法制建设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却不能够弱化或者是边缘化半正规化和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的发展。这三部分的法律工作者职业化程度虽然不同,但是服务了不同人口的法律需要。分析中,他利用了1987年——2003年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律师的数量与比重变化表和调解委员会调解民事纠纷与法院一审的民事案件数量的比率表,来表明半正规化和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在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下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8]与计量分析方法不同的是,图表分析方法目前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即对研究的结论进行佐证和补充说明。它并不能作为一种独立和主要的研究工具来解释问题。但是由于它简单明了、易于操作,目前而言也广泛运用于法学研究领域。

数量分析方法中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数理模型法。它主要是将数学分析中的各种模型运用在现实的法学领域中,也就是直接用数学方法来解释法学问题。Elisabeth(1978)曾经利用了一个收养婴儿的供给和需求模型从而表明现有的法律规制是如何通

过破坏自由市场中婴儿供求的平衡而导致婴儿短缺的现象发生,并进而导致了婴儿“黑市”的产生。他还利用这一模型证明了儿童主要还是依靠政府而寄养于公共收养机构而不是私人家庭收养的问题。^[9]Tina(2009)在研究商业腐败问题时,在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情况下比较了公司选择诚实战略或者商业腐败的两种不同的收入模型,证明了风险厌恶型的公司更倾向于提供商业贿赂,风险中性型和风险偏好型的公司反倒更倾向于选择诚实战略。^[10]数理模型法的困难之处在于变量的选择和模型的建立,之后还必须进行大量的数学推导。因此它与前两种方法相比,应用的范围较为狭窄。

而社会调查法是系统搜集有关法学问题的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多用于调查某项政策或是法律的效果。刘松涛(2001)通过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对9家新闻纸生产的国内企业进行调查,由此对反倾销法领域的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对于倾销的认定、损害因果关系认定等几个方面也做了大量的论述。^[11]袁达松(2005)采用社会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了经济法律制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防卫内经济风险与危机存在与否及其程度的大小,并提出了一系列以经济法律制度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与危机的科学对策。^[12]但是由于社会调查法应用起来比较困难和复杂,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得到的结果往往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并不被广泛使用。

此外,数量分析方法还可以应用于实体法律的分析。在反垄断法的市场结构的研究中,Thomas(1967)通过使用美国国内收入署提供的所有消费品产业中41个小产业的样本,分析了广告、市场集中度、规模经济和其他因素对产业盈利性的共同影响。^[13]William(1989)则利用版权保护的基本经济学模型对最佳版权保护进行分析,并将其运用于版权法的其他问题,如衍生作品的保护以及如何公平使用等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对于实体法律的立法和完善有积极的作用。^[14]

三、结论和评价

数量分析在目前世界上尤其是我国的法学领域中的应用并不广泛。首先,大多数的法学科科研成果偏重于定性分析,而忽略了数量分析的内容,这实际上极大的削弱了法学的实践影响及其理论的可靠性和建设性。目前在我国的流法学期刊中,能用数量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学问题的几乎是凤毛麟角。有学者曾经统计过2005年中国法律经济论坛提交的47篇会议论文,其中仅仅只有1篇论文进

行了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同样在2004年的法律经济论坛中的29篇论文也只有4篇运用一定的实证数据进行分析。其次,目前的数量分析大多也停留在简单的数据分析和模型建立,往往只有一些图表或者数理模型,并没有操作化的尝试,这从一定程度也使得数量分析没办法落实于实践而成了一纸空文。最后,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数量分析的意识,还是习惯于借助法学的概念和理论模型对问题进行论述,却并不习惯于实证分析、用现实生活的数据来验证理论模型的推导。

虽然法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但是目前而言,数量分析在该领域应用的研究还不多。这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集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重大问题。其内容涉及广,方法多,随着时代的发展,数量分析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还有待继续深入和发展。

注释:

[1]布莱克著,唐越、苏力译:《法律的运作行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周林彬等:《法律经济学: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冯玉军:《法律与经济推理: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4]白建军:《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35-145页。

[5]Laszlo Goerke,“An economic analysis of dismissal legislation:Determinants of severance pay in West Germany”,*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30(2010),pp.71-85

[6][11][12]史际春等:《经济法学评论》(第二卷、第三卷、第六卷、第七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006年版。

[7]王福华等:《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之检讨》,《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3-16页。

[8]朱景文:《中国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化分析》,《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23-35页。

[9]Elisabeth M.Landes and Richard A.Posner,“The Economics of the Baby Shortage”,*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7,No.2(Jun.,1978),pp.323-348

[10]Tina Szeide,“Too risk averse to stay honest? Business corruption, uncertainty and attitudes toward risk”,*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29(2009),pp.388-395。

[13]胡甲庆:《反垄断的法律经济分析》,《西南政法大学》2005年版。

[14]William M.Landes,“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Law”,*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18,No.2(Jun.,1989),pp.325-363。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孙 菲)